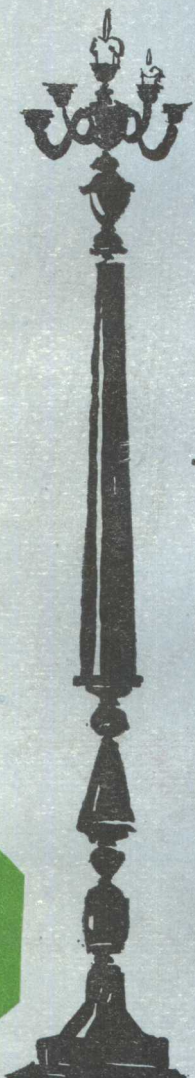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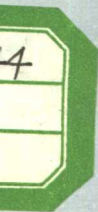




# 伊凡·伊里奇的死

---

列夫·托尔斯泰著  
草 婴译



# 伊凡·伊里奇的死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 婴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 伊凡·伊里奇的死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 嬰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125 字数: 50 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0 册

书号: 10088·932 定价: 0.44 元

## 谈谈《伊凡·伊里奇的死》

草 嬰

托尔斯泰晚年在《忏悔录》里写道：“我发生了这样的事，就是我们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不仅令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我们的一切活动、议论、科学、艺术——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象是胡闹。我懂得了，在其中探求意义是不可能的。而创造了生活的劳动人民的劳动，依我看才是唯一真正的事业。我懂得了，这种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于是我接受了它。”

托尔斯泰说这话虽然带有偏激情绪，但他的世界观经过长期酝酿确实发生了激变。他通过几十年的生活经历，看透资产阶级贵族社会的腐朽没落，痛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虚伪，同时认识到创造生活的是劳动人民，只有他们的生活才具有意义。由于世界观的转变，他在八十年代后创作的作品，如中篇小说《霍斯托密尔》（1885）、《伊凡·伊里奇的死》（1884—1886）、《疯人笔记》（1887）、《克鲁采奏鸣曲》（1887—1889）、

《谢尔吉神父》（1890—1893）、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寓意更加深刻，文笔更加素朴，而艺术效果也更加感人。

拿《伊凡·伊里奇的死》来说，这篇小说对贵族官僚的虚伪自私作了无情的揭发，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空虚无聊更描写得入木三分。故事情节非常简单：沙皇政府的一名官员得了癌症，病情不断恶化，他病中回顾一生，才发现过得“不对头”，最后在肉体和精神极度痛苦中死去。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托尔斯泰却创作了一部震撼心灵、发人深思的作品，使莫泊桑读了深为折服，忍不住感叹说：“我看到，我的全部创作活动都算不得什么，我的整整十卷作品分文不值。”

《伊凡·伊里奇的死》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托尔斯泰运用了高超的艺术手法。这种艺术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 高度的真实

托尔斯泰创作的基本特点就是真实。他在早期创作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里就明确地指出，他作品的主人公就是真实。以后他一直恪守这个信条从事创作，而到了晚年，这方面更有所发展。我们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总会不知不觉地

被吸引到他所描写的境地，仿佛亲眼看到他所塑造的一个个人物，听到他们的言谈，体会到他们的感情，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

《伊凡·伊里奇的死》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没有故弄玄虚的冲突，没有矫揉造作的描写，也没有华而不实的词藻。一个平凡的人，过了平凡的一生，又平凡地患病死去。故事固然简单，文字也朴素得象白描，但我们读来却觉得脊梁发冷，毛骨悚然，并且情不自禁地会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故事用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开始，一下子就把旧俄官僚的众生栩栩如生地揭露在读者面前。你看：他的死讯首先引起同事们反应的是，他一死对他们本人和亲友在职务调动和升迁上会有什么影响。有人立刻想到，自己可以因此升官，增加收入。有人想到，可以为亲戚谋个好差事。对于他的死，他们嘴里都表示惋惜，心里却个个暗自庆幸：“还好，死的是他，不是我。”短短一句话就把官僚们极端自私的嘴脸揭露无遗。什么友谊，什么交情，统统都是假的，大家所关心的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我”。

彼得·伊凡内奇慰问遗孀的一幕也十分深刻。彼得·伊凡内奇原是伊凡·伊里奇的“知交”，按照规矩他必须关心朋友的后事，慰问慰问遗孀，但他没有半点悲痛的感情，对朋友的家

属也毫无同情心。他只是为了“尽礼”才不得不敷衍一番，装装样子，心里却念念不忘晚上的牌局。他装模作样地向孀妇说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那位孀妇也“照例”拿出麻纱手绢捂住鼻子哭一阵。但她对丧夫也并没有多少悲伤，真正关心的是丈夫死后能领到多少抚恤金。就这样，通过极其真实的细节描写，作者把上流社会朋友之间的假仁假义和夫妇之间的虚情假意揭露得淋漓尽致。

伊凡·伊里奇这个形象，通过身世和特点的细致描写，显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他“能干，乐观，厚道，随和，但不能严格履行自认为应尽的责任，而他心目中的责任就是达官贵人所公认的职责。他从小不会巴结拍马，成年后还是不善于阿谀奉承，但从青年时代起就象飞蛾扑火那样追随上层人士，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接受他们的人生观，并同他们交朋友。”这样一段描写就把一个旧俄官僚的轮廓勾勒出来，展示在读者面前。接着，作者又把伊凡·伊里奇进入官场后精神面貌的变化作了生动的描写。

伊凡·伊里奇一心一意向上爬，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权力欲也越来越强。“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对任何人都操有生杀大权，每次走进法庭和遇到下属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气派（即使只是表面的），在上司与下属之间周旋的本

领，尤其是自觉高明的办事能力——这一切都使他扬扬得意。”

关于伊凡·伊里奇的家庭生活，作者也写得十分真实而令人信服。婚后他过了一段短暂的快乐生活，但不久经济负担，夫妻争吵，使他对家庭生活越来越厌恶，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地位，又不得不“维持社会所公认的体面的夫妇关系”。这样的家庭生活在当时上流社会里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具有典型性。

伊凡·伊里奇得了不治之症后，他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不断加深，但他周围的人，包括妻子和女儿，都若无其事，待他十分冷淡。医生替他看病，也很冷酷，没有丝毫同情心。医生那副神气仿佛在说：“你一旦落到我手里，就得听我摆布。”这同伊凡·伊里奇在法庭上对待被告一样。法官草菅人命，医生同样不把病人的生死放在眼里，托尔斯泰就是这样怀着按捺不住的愤慨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真实地描绘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 突出重点

《伊凡·伊里奇的死》还显示了托尔斯泰晚期作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删繁就简，突出重点。

这篇小说的内容归纳起来只有这样几件事：



伊凡·伊里奇的经历，他的家庭生活，他的病和死，以及他死后的反应。故事采用倒叙法，先写他的死所引起的反应，着重描写俄国官僚的自私。接着又通过慰问遗孀的一幕进一步揭示上流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关系。例如，在吊唁时施瓦尔茨向彼得·伊凡内奇挤眉弄眼，暗示晚上的牌局不变。孀妇从彼得·伊凡内奇那里知道不可能弄到更多的抚恤金后，就想尽快摆脱这位客人。作者利用这样一些细节描写，表面看来似乎无足轻重，其实正好是抓住重点，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撕下上流社会的假面具。

对伊凡·伊里奇经历的介绍，作者也是分几个阶段而又突出重点。

青年时代他在法学院念书，还有点朝气，还有点正义感，但离开学校，走上仕途后，就掉进庸俗的官场的泥淖里，而且越陷越深，不知不觉成为沙皇统治机器里的一个零件。他醉心功名，争权夺利，步步高升，从省长特派员升为法院侦讯官，从法院侦讯官升为副检察官、检察官，最后当上司法部大官。作者对他的宦海浮沉不作铺陈，而着重描写他随着地位上升而发生的精神变化。例如，他毕业后当省长特派员时，“待人接物，稳重得体，对上对下，恰如其分”，而在处理公务上则异常审慎，铁面无私。当上法院侦讯官以后，他在省里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却周旋于

司法界头面人物和豪门巨富之间，对当局稍表不满，发表温和的自由主义言论和开明观点。而在升任副检察官后，“新的官职、重要的地位、控诉任何人的权力、当众的演说、辉煌的功绩——这一切使伊凡·伊里奇更加官迷心窍。”七年后，他调到另一个省当检察官。那时，“他的全部生活乐趣都集中在官场的天地里。这种乐趣支配了他的整个身心。”

作者就这样把主人公“官迷心窍”的发展作了细腻而深刻的描写，既分阶段，又突出重点，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比较单纯的大学生，一旦进入官场，精神上怎样逐渐堕落而丧失原有的高尚品性。

在家庭问题上，作者着墨更少，只着重揭露上流社会夫妇生活的虚伪和冷漠。伊凡·伊里奇同他的妻子尽管都同属上流社会，他们的结合表面上是“门当户对”，但由于志趣不同，实际上是“同床异梦”。伊凡·伊里奇一味追求名利地位，妻子则跌进庸俗的上流社会生活的泥淖。伊凡·伊里奇得病后，妻子不但不照顾他，不同情他的痛苦，而且恨他脾气暴躁，甚至巴不得他早点死。但她又想到不能真的让他死，因为他一死，家庭经济来源断绝，日子就不好过了。但妻子女儿不顾伊凡·伊里奇病情日益恶化，照旧出入剧场舞会，寻欢作乐。伊凡·伊里奇在肉体 and

精神极度痛苦中垂死挣扎，妻子还责怪丈夫不肯听医生的话按时服药，暗示他咎由自取，与别人无关。托尔斯泰就这样抓住夫妇生活极端冷漠自私的关系，无情地撕下上流社会家庭生活的假面具。

## “心灵辩证法”

车尔尼雪夫斯基精辟地指出，“托尔斯泰伯爵才华的特点是他不限于描写心理过程的结果，他所关心的是过程本身”，“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辩证法”。

在《伊凡·伊里奇的死》里，这种心灵辩证法的描写特别生动。伊凡·伊里奇从得病到去世，这几个月里他的内心活动十分复杂，变化多端。发病初期，伊凡·伊里奇只关心一个问题：他的病有没有危险？他一面遵照医生的指示：服药，注意卫生，积极养病，一面又很关心别人患类似的病，他竭力安慰自己，病会好起来，同时又消极悲观，觉得没有复原的希望。他患得患失，忧心忡忡，不能自拔。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他的精神越来越沮丧。他觉得，有一种神秘可怕的东西在不断吮吸他的精神，硬把他往什么地方拉。他意识到“他的生命遭到毒害，他还毒害了别人的生命，这种毒害不仅没有减轻，而且

越来越深地渗透到他的全身”。同时他又觉得，在这样的生死边缘上，他只能独自默默地忍受，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这种悲哀的心情不断发展，他对周围的反应也特别敏感。内弟看到他可怕的病容，不觉大吃一惊。伊凡·伊里奇立刻察觉这一点，问他：“怎么，我的样子变了吗？”内弟避而不答。他照镜子，发觉自己脸无人色，更加颓丧。在病情垂危阶段，他想到了生死问题。“是啊，有过生命，可现在它在溜走，而我又留不住它，是啊，何必欺骗自己呢？除了我自己，不是人人都很清楚我快死了吗？问题只在于还有几个礼拜，几天，还是现在就死。”接着又进一步想：“等我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等我没有了，我将在哪儿？难道真的要死了吗？不，我不愿死。”

在这种绝望的心情中，他常常觉得死神就在身边，它从各个角落窥测他，要抓走他的生命，他吓得魂不附体。临死前，他感到最痛苦的是，周围人人都在撒谎，他生活在谎言之中。“谎言，在他临死前夕散布的谎言，把他不久于人世这样严肃可怕的大事，缩小到访问、挂窗帘和晚餐吃鳊鱼等小事。”他想大声疾呼：“别再撒谎了，我快要死了，这事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所以大家别再撒谎了。”但他又没有勇气这样做。

除了对谎言的深恶痛绝外，他在临死前还感到异常孤寂：“那是一种处身在闹市和许多亲友中间却没有人理睬他而感到的孤寂，跑遍天涯海角都找不到的孤寂。”这种悲怆的心情折磨他一直到死，而伊凡·伊里奇的心灵辩证法到此也就结束了。

伊凡·伊里奇的死不由得使人想到《安娜·卡列尼娜》中尼古拉的死。托尔斯泰描写这两个人物痛苦的死都令人心惊胆战，但伊凡·伊里奇临死前的心理活动比尼古拉临死前的心理活动更加复杂，更加悲惨。这说明托尔斯泰到晚年运用心灵辩证法更加圆熟，更加精到，不能不使人叫绝。

## 鲜明的对比

托尔斯泰写《伊凡·伊里奇的死》也象写其他作品一样，充分使用对比手法来加强艺术效果。例如，贵族上流社会同庄稼汉盖拉西姆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伊凡·伊里奇的同事、朋友、家属个个戴着假面具，一辈子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尔虞我诈；庄稼汉盖拉西姆就完全不同，他从来不说一句谎话，待人诚恳厚道。伊凡·伊里奇的妻子不但不照顾丈夫，而且嫌他脾气坏，憎恨他，对他没有丝毫感

情；盖拉西姆却尽心尽力服侍东家，不怕累，不怕脏，没有一句怨言，而且诚恳地安慰他，衷心希望他能痊愈。

这种鲜明的对比一方面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的爱憎，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使读者更深切地感觉到资产阶级贵族的伪善和自私，同时认识到劳动人民真挚善良的品德。

作者拿伊凡·伊里奇病中的痛苦和周围人们的冷漠作对照，进一步揭发上流社会家庭关系的虚伪，加强人们对它的憎恶。

伊凡·伊里奇被疾病折磨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而妻子却保养得白白胖胖，眼睛发亮，全身充满活力，女儿更是服饰漂亮，身体健美，青春洋溢。两相对照，病人的模样就显得格外可怕，而病人在精神上也就更痛苦，更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

上述几种艺术手法是托尔斯泰创作的特点，而在他的晚期作品里又有发展，《伊凡·伊里奇的死》可以说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

在法院大厦里，当梅尔文斯基案审讯暂停时，法官和检察官都聚集在伊凡·叶果罗维奇·谢贝克办公室里，谈论着闹得满城风雨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情绪激动，认为此案不属本院审理范围；伊凡·叶果罗维奇坚持相反意见；彼得·伊凡内奇一开始就没加入争论，始终不过问这事，而翻阅着刚送来的《公报》。

“诸位！”他说，“伊凡·伊里奇死了。”

“真的吗？”

“诺，您看吧！”他对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同时把那份散发出油墨味的刚出版的公报递给他。

公报上印着一则带黑框的讣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高洛文娜沉痛哀告亲友，先夫伊凡·伊里奇·高洛文法官于1882年2月4日逝世。兹订于礼拜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凡·伊里奇是在座几位先生的同事，大家都喜欢他。他病了几个礼拜，据说患的是不治之症。他生病以来职位还给他保留着，但大家早就推测过，他死后将由阿历克谢耶夫接替，而阿列克谢耶夫的位置则将由文尼科夫或施塔别尔接替。因此，一听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办公室里的人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对他们本人和亲友在职位调动和升迁上会有什么影响。

“这下子我很可能弄到施塔别尔或文尼科夫的位置，”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这个位置早就说好给我了，而这样一提升，我就可以在车马费之外每年净增加八百卢布收入。”

“这下子我可以申请把内弟从卡卢加调来，”彼得·伊凡内奇想。“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如今她可不能再说不关心她家的人了。”

“我早就想到，他这一病恐怕起不来了，”彼得·伊凡内奇说。“真可怜！”

“他究竟害的是什么病啊？”

“几个医生都说不准。或者说，各有各的说法。我最后一次看见他，还以为他会好起来呢。”

“自从过节以来我就没有去看过他，去是一直想去的。”

“那么，他有财产吗？”

“他妻子手里大概有一点，但很有限。”



“是啊，应该去看看她。他们住得太远。”

“从您那儿去是很远。您到什么地方去都很远。”

“嘿，我住在河对岸，他总是有意见，”彼得·伊凡内奇笑眯眯地瞧着谢贝克，说。大家又说了一通城市太大，市内各区距离太远之类的话，然后回到法庭上。

伊凡·伊里奇的死讯使每个人不由得推测，人事上会因此发生什么更动，同时照例使认识的人都暗自庆幸：“还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嘿，他死了，可我没有死，”人人都这样想，或者有这样的感觉。伊凡·伊里奇的知交，他的所谓朋友，都同时不由自主地想，这下子他们得遵循习俗，参加丧礼，慰问遗孀了。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凡内奇是伊凡·伊里奇最知己的朋友。

彼得·伊凡内奇跟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同过学，自认为受过伊凡·伊里奇的恩惠。

午饭时，彼得·伊凡内奇把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告诉了妻子，同时讲了争取把内弟调到本区的想法。饭后他不休息，就穿上礼服，乘车到伊凡·伊里奇家去。

伊凡·伊里奇家门口停着一辆自备轿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前厅衣帽架旁的墙上，靠着带